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笔谈之一)

编者按: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的事实和特点,提出了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的新时代课题;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与软实力。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之下,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出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讲话”发表之后,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新努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无不标示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新进展。从话语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上述探索只不过意味着破题立论,一系列涉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构的重大话题亟待展开。有鉴于此,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于2018年夏初主办了以“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为题的专题研讨会,以期推动相关探讨向纵深发展。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专题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

关键词:中国知识体系;本土问题意识;东方专制主义;东方自由主义;祖赋人权;自身人类学;国家人类学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8.01.01

中国文明的复兴和知识重建

郑永年 杨丽君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杨丽君,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教授)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①。就经济而言,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贫穷的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封闭状态的经济体,转型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这些变化的背后,是从计划经济向中国经验市场经济制度

^① 有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参见 Zheng Yongnian, *Contemporary China: A History since 1978*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014)。

的转型。就社会发展而言,四十年来已经促成了近七亿人脱贫,同样为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同样显著,包括人口寿命、教育、社会保障、住房,以及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制度经历了各种挑战,并且在挑战中不断调整和完善。这一系列的深刻制度变革,需要学者们来解释、提升,加以概念化和理论化,从而创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体系。

然而遗憾的是,当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社会科学界最大实验场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并没有承担起解释中国的变革,为世界社会发展贡献知识的责任。社会科学领域发展滞后的现状不仅影响到了中国的知识重建,更累及中国文明的复兴。任何一种文明,其内核都是代表这个文明的知识体系。或者说,知识体系是一种文明的最高表达。从知识构建的角度讲,正是伟大的知识造就了文明,任何文明都需要一套完善的知识体系来支撑。但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局面并非如此。一方面是改革的作为和文明的复兴,另一方面是能够解释改革实践的知识的缺失。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倡媒体和智库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但是由于缺乏一套知识体系支撑,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我们所讲的“中国故事”,外界听不懂。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讲好“中国故事”的最终结果却是“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现象的产生,最根本的症结在于改革开放乃至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在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结果不仅外在世界不感兴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自己。很显然,这种现象必须得到改变。

一般意义上,人们把1840年代的鸦片战争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主要意味是凸显西方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了,大清帝国从此开始走向衰败。的确,在促成中国传统帝国体系离开历史舞台过程中,西方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马克思尽管无情地谴责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但也充分肯定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在马克思之前,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静止的^①。如果按照欧洲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确没有历史,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形态几乎没有发生过巨大的变化。而中国新的历史就是在和西方接触后才开始的。鸦片战争是关键,之前中国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一直有能力应付外来的挑战,因此没有深刻变革的意图和需要,但几次战争失败之后,不得不开始进行主动的变化和变革。

那么,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呢?有两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是美国史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认为中国是随着西方的变化而变化的,西方带来冲击,中国回应^②。与此相反,另一位美国史学家柯恩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强调,中国的变化体现得更多的是中国自身的发展逻辑,外来(西方)力量促使甚至促成了中国的变化,但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本身的发展逻辑,或者说,中国的变化没有使得中国西方化^③。

如何解释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学者看法不同,这里并没有对错之分,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所指的变化层面的不同,因为在不同层面,人们看到不同的东西,因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在思想意识层面,近代以来肯定是“西方化”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语言、概念、理论和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都是“西化”的结果,无论是浅层的思考还是深层的思维,无一不和西方有关。到今天为止,思想知识界还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基于中国现实并且能够解释中国现实的概念或者理论。现象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撮其要者,在于近代文明由西方主导,有人甚至把近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西方在近代文明的发展和构建过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基于西方近代化发展经验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近代以来

①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② John K. Fairbank and D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③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西方发展经验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由区域经验产生的理论,自诞生以来就被作为人类发展放之四海皆准的理论,这使得西方知识体系不仅具有了普世性,同时也被赋予了价值观。

很容易理解,西方学者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时,总是以西方的制度为模版,认为西式的制度模式是先进的,反之就是落后的和需要改造的。这种具有普世性价值观的西方知识体系思考导向,也使得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总是以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西方所具有的东西。从近代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中国没有私有产权”、“没有法治”、“没有人权”、“没有民主”等等,都是用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的发展。简单地说,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从来没有用中国已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其实无论是“冲击—回应”模式,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在用西方经验所产生的理论,而不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来解释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解释与其说是“解释”,倒不如说“判断”。这里的荒唐性不言自明。如果要解释中国,那么必须找到中国所具有的因素。如何用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呢?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无疑,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知识体系也严重影响和主导了中国学者对自己的认知。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和知识体系的学习过于“全盘西化”,特别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学习,注重知识的吸收而轻方法论的思考。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尽管在思想和概念方面非常西化,却不能够发展出解释本国社会变迁的理论的原因所在。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即使整个社会科学话语是从西方“进口”,人们也习惯于使用西方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但这并不否定在更深层次上中国式思维的存在。实际上,这种传统思维根深蒂固,并且不时表露出来,成为一些人抵御西方思想的有效武器。但因为现代社会科学及其思维的缺失,传统思维不能表述为概念和理论,同样不能解释中国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哲学、国学和文化现象的再生,很难聚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相反,这股力量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巨大阻力。

在物质变化方面也是如此,表现出诸多西方化的迹象。首先,至少没有人会拒绝西方式的变化。当然,在很短的一段特殊时期里,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把西方式物质变化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实际上,近代以来到今天为止最长盛不衰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要学习西方物质发展模式。这并不难理解。近代中国被西方所打败,主要是因为西方物质方面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进步。在早期,一些人秉持义和团式“刀枪不入”的态度,鄙视西方的物质进步,但在被西方彻底打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态度,转向学习西方。早期学习西方主要是想学习西方的物质进步,等到被亚洲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昔日的学生日本打败之后,才又意识到光有物质的进步远远不够,还要学习西方的思想。至少就日本本身的解释,其进步是“脱亚入欧”的结果。中国要在物质层面学习甚至赶超西方,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的梦想。从毛泽东时代到当代,“赶超”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哲学思维”了。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各个方面落后于西方,并且被帝国主义所包围,提出“赶超西方”还可以理解。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没有面临毛泽东时代那样的地缘政治环境,不过人们仍然具有强烈的“赶超”心态,足见这种哲学的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即便是在某一时期部分性地在制度方面借鉴西方,其根本目的也是为了物质文明的进步。比如说1980年代进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最大的分歧在于制度层面。不管怎样的社会,制度是其核心,因为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中介。可以说,没有制度就没有社会。近代以来,就中国的制度如何变化有海量的讨论,但根据历史进程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几种。第一,早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基本制度不用变革,需要变革的是那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术”。第二,“全盘西化”。“五四运动”之后很长时间内,盛行这种观点。直到今天,此种观点在知识分子中间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第三,“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这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观点,当时东亚一些经济体已经或者开始实现民主化,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在这些社会,政治体制民主化了,但社会生活仍然是东亚传统^①。

很显然,近代以来,就制度而言,无论是社会层面,政治层面还是经济层面,中国并没有像思想和物质层面那样西方化。当思想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当物质生活西方化的时候,人们总是以为制度也会西方化,更不乏有人呼吁主动的西方化。但从经验层面看,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只是浅层的西方化,仅仅只是表象甚至是假象。更有意思的是,在思想和物质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

此种悖论如何予以解释?一种解释是基因论,即认为中国的制度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思想和物质条件,有能力进行“再生产”,而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黑格尔就是这么解释中国的,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如此,如上所述,西方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走到黑格尔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化眼花缭乱;但中国自从秦始皇帝统一之后,在制度层面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西方的变化。

第二种解释强调制度变化的缓慢性^②。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限的,因为它往往首先发生在某一个或者几个领域;思想层面的变化最具有局限性,因为它往往只发生在知识界的某些人中间。因为制度乃社会最大多数人的生活调节器,它不会随着物质和思想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指向既得利益对制度变化的阻碍。如果当社会的大多数就是阻碍变化的既得利益者的时候,制度变化就很难进行。中外历史上,也经常发生通过“消灭”“既得利益”而引入的制度变化,即革命。不过,还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就这种需要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的变革达成过共识。

第三种解释指向“量变而质不变”,强调建立在世俗文化之上的中国制度的灵活性和伸缩能力。就是说,中国的制度能够吸收消化任何外来的压力,在“量”的层面不断变革自我,而在“质”的层面(也就是在结构层面)“再生产”自己,从而实现自我更新^③。

物质、思想层面的变化与制度层面的变化的高度不一致性,直接地反映在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上。简单地说,中国的概念理论与制度实践严重脱节,知识体系对制度现实没有解释能力。这种情况自近代到今天,不仅没有变化,反而越来越严重。就以今天人们一直在讨论的“中国道路”为例。中国道路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自近代到今天中国所经历的历程就是“中国道路”。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在物质和思想层面,“中国道路”受西方(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主义”)的影响也属显见,在这两个层面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东西。然而,在制度层面如何解释“中国道路”呢?

如果不加以“中国化”,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发展史观也解释不了中国制度的演进,更不用说其他西方理论了。例如,在经济制度层面,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主要概念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后来的“水利社会”。如果人们搞清楚西方思考中国的思维脉络,那么就不难发现,今天西方指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就与早先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水利社会”直接相关,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来源。

很显然,“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与其说是解释中国的概念理论,倒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的“偏见”。自古到今,中国的“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并非西方的“国家”所能比拟,甚至经济本

① 对这几个观点的综合性论述,见 Zheng Yongnian, *Globalization and State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强调中国历史的变迁的同时,指向了中国历史的韧性和一致性。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③ 参见 Yongnian Zheng and Yanjie Huang, *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身的概念在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抛开其意识形态性质不说,问题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不能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至少从汉代开始,国家始终垄断关键的经济领域。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的垄断,决定了中国没有可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就没有市场,就没有除了国家之外的经济角色。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历史时间里的大多数经济领域,国家并不是主要的经济角色。除了国家之外,还有民营企业,还有民间和政府的合作。近代的人们把当时的经济分为“官办”、“官督商办”和“商办”是相当科学的。当然,也有外国人开办的经济企业。今天人们称中国经济为“混合经济”,就是指这种复杂的经济形态。当经济活动的半壁江山是非国有且非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超越国有部门的时候,就很难用“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中国经济了。

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制度方面。从古希腊的“东方主义”到近代的“东方专制主义”、20世纪的“极权主义”,再到当代层出不穷的各种版本的“权威主义”,西方对中国的解释只有一个范式。马克思主义对传统中国的解释也是这个范式的一个变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对解释中国的贡献就是证明了在“东方专制主义”背后还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或者“水利社会”。但正如“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不了中国经济,“东方专制主义”也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早期西方传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他们误以为中国比西方更为“共和”,甚至认为中国才是真正的“共和”体制,即皇帝和大臣(官僚体系)之间的“共和”。这当然是一个假象,因为此“共和”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共和”,但也点出了中国皇权体系内部的权力分配的客观状态,这种状态并非“东方专制主义”所能解释。

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学者,基本上仍然是沿着这个古老的思维范式来解释中国的体制变化,解释这个体制为什么那么具有韧性,但鲜有人解释这个体制到底如何运作,以及用什么样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这个体制。尤其是当中国的社会经济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时候,怎能仍沿用原来的范式来解释呢?中国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观察中国体制的实际运作,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的概念和理论,但这个基本的任务鲜有人感兴趣,导致理论解释严重滞后于中国自身社会变化的局面。直到今天,人们仍热衷于拿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一切。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质疑和怀疑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知识体系,因为这个知识体系是对西方知识体系的简单移植,并不能有效解释中国自身。人们更有足够的理由来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实践与人们所接受的理论概念之间出现巨大差异、甚至发生重大矛盾的时候,人们就会惊讶,甚至愤怒,对现实产生巨大的不满。这种情绪在思想意识上可以理解,但在理论构建上则是一无所用。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现实是客观存在的。

如何重塑中国的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界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任务。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或者不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那么学者们的思维会一如既往地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学者们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西方知识的“贩卖者”。

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

徐 勇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座大厦。要构建这样一座大厦,需要从概念着手。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抽象出来,加以概括,作为自我认知意识的一种表达,由此形成一定的概念——它通常用单词或者短语加以表达。通过概念对事物进行定义,形成其内涵与外延,就使得杂乱无章的事物清晰化、条理化。因此,概念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①。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学术创新,当从概念入手,包括解构与建构,双管齐下。

一、概念并非永恒,解构必不可少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概念的建构,形成一套能够传播的知识体系。人类的认识与其他领域一样,都遵循着“先占原则”,即某些人由于对事物的认识在先,通过概念对事物加以定义,并能够广泛传播,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获得话语权。后人在接受这些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会进入其相应的思维通道,形成格式化、规范化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力量。

中国很早就形成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一个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许多论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社会科学由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先占”法则。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②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些概念,社会科学就没有了立足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需要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

但是,任何概念都有其局限性。人类的认识没有穷尽,因此,没有永恒的概念,只有永远的讨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全方位开放格局下,引进了大量新知识、新概念和新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先占原则”的作用,使得我们对外来的理论更多的是学习,而少有批判;对外来的概念更多的是接受,而少有解构,由此出现将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

① [美]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② 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章第五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16年5月18日。

当成“唯一准则”的现象。这种新的教条主义自然会束缚中国学者的原创力。

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除了学习与接受,还要有分析、有鉴别,进行学理性批判。在相当长时间,人们对外国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武器更多的是“武器的批判”。这种批判很难有效,甚至适得其反,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又会发生变化。当下,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的分析、鉴别,主要应是学理性批判,其中包括对流行甚久的概念的解构。

解构是一种分解,发现概念的适用性和弱点。任何概念都非完美无缺,只有通过深入其内部进行辨析,才能有所发现,从而对原有概念加以补充、扩展,当然也可能是颠覆。

“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人对东方包括中国政治的定义,影响甚大。实际上,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政体,是一种久远的政治历史现象,在世界政治史上普遍存在。由于时空的错置,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民主政治之后,专制主义政体在东方社会还存续着。与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相比,专制主义在正当性方面处于低位。西方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在“专制主义”之前冠以“东方”,造就“西方自由和东方专制”的框架,并形成思维定式。其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部头著作。毫无疑问,魏特夫的著作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但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并非无懈可击,甚至有致命的缺陷。他的论述基础是把东方国家定义为“水利社会”,因为干旱,国家规模大,需要由政府而不是当事人来组织、兴办和管理水利公共工程。政府依靠暴力强制获得税赋,并兴办公共工程,这种暴力强制产生的是奴役关系。如果从解构的角度看,魏特夫的论断至少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东方国家并不都是干旱地区,特别是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稻产区。稻作地区主要依靠的是当事人的自愿联合进行水利治理,政府在这类区域是“悬浮式”的外在权力^①。二是在非“水利社会”,同样会产生专制主义。如俄国的专制主义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但俄国并非“水利社会”。因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只是对传统东方政治的部分概括,不能作为理解东方政治的“唯一准则”。

二、概念创造不足 建构势所必然

解构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概念,形成概念之间的竞争,并在竞争中获得话语权。

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加以表达。进入20世纪,社会科学得以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但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著书虽多,“立说”却少。如从中国学术著作的名称便可以看出,大量的是“中国的……”,主要是陈述一种事实,而缺乏诸如“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性概括,难以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将人的思维模式化,大大弱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反,建构概念则是西方学术的优势,也是西方学术能够取得话语权的重要原因。政治学者海伍德指出:“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②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做人类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如“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道义小农”等,这些概念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有人因此认为,当代中国所有人类学者的影响力比不上一个斯科特。

本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国人最有条件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总结,但国际上流行的是在传统“威权”的概念后面加上一个“韧性”,从而将人们的思维框架规范在“威权韧性”之内,并借由国际学术传播传到国内,被奉为圭臬。

^① 徐勇:《从中国事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补充》,《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

^② [美]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因此,中国的学术创新要改变被动地位,必须从创造概念做起。创造新的标识性概念,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发现新的事实,从事实中提炼出新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说是描述性概念。

一般来讲,概念是对事实的概括,即通过对一类事实的描述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穷尽事实,只是对部分事实的概括;同时,在概念产生之后还会出现新的事实,这是原有概念所无法概括的。但是由于知识生产的“先入为主”原则,人们很容易用一个固有的概念去认识所有事物,从而形成思维定式。如西方政治学对东方政治的界定,长期延续的是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等概念,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些概念去认识东方政治,将思维格式化。然而,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只是对东方政治事实的部分概括,有相当的限度。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概念的核心是统治者与民众的主—奴关系。从事实的角度看,如果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民众都处于奴役地位,如何能够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改革开放以后又如何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①正是在对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概念进行解构的过程中,笔者根据中国社会事实,提出了“东方自由主义”的概念。因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村社制、庄园制的组织制度,其中内含着农奴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将东方政治定义为专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具有奴役关系的基础社会制度。而在中国,自秦以后实行的是一家一户的家户经济和“编户齐民”的政治制度^②,国家与农民的纵向关系具有奴役性,但受统治能力的限制,这种奴役性并非无时不刻地发生在民众身边。从日常生活的横向关系看,中国农民是自由的。与西方领主既占有土地也占有人身不同,中国的地主只占有土地不占有人身。家户制内含着自主自由的属性。尽管这种属性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并与责任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横向关系的自由,从理论上概括便是“东方自由主义”^③。事实上,毛泽东早就讲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④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农村改革就是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只是在不同时空里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较早地提出了“自由”概念,就放弃之。同时,自由只有扎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充分挖掘事实,才会发现自由并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外部空降,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土壤里,只是这一因子受到专制主义政治的压制。而在人民民主政治框架下,“自由”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人类文明进程具有多样性,任何人的认识都受到其生活的历史空间所限制。西方学者从自己的文明进程出发,提出了不少重要概念,并有着广泛影响。“天赋人权”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但它不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大量事实现象无法用这一概念加以概括。如果仅仅限于这一概念,许多事实就会被遮蔽。例如,与西方人信奉上帝、处处可见教堂有所不同,中国人信奉祖先,处处可见祠堂。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祖宗赋予后人以生命、资格、地位、权利与义务等,这一理念至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人在处理领土边界争端时经常讲到的一句话,便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受此启发,我们在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提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以对这一类事实现象加以描述^⑤。

二是要基于某种价值观念形成新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说是规范性概念。

人类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是一种需要价值导向的活动。描述性概念只是对既有事实的概括,而非价值导向性概念。西方政治学之所以领先,其重要原因是西方政治文明进程具有跨越性。早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就产生了一种高级政治形态——民主共和国,其中蕴含着大量现代政治的因

① 徐勇:《用中国事实定义中国政治——基于“横向竞争与纵向整合”的分析框架》,《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② 徐勇《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③ 徐勇:《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发掘——兼论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4期。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3页。

⑤ 徐勇:《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子,如自由、民主、权利等。在西方政治文明进程中,文明不断地被“炸毁”,又不断地重建。因此,西方学者特别擅长于根据某种价值理念进行概念建构,以引领社会前进。这种概念并不是基于事实,或者主要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主要基于某种价值理念促进或限制某种行为方式,因此属于规范性概念。“天赋人权”便是人们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等级束缚所建构的概念,它指引着人们对旧制度的革命。中国的文明进程不同,长期延续的是“祖赋人权”,其中内含着差等意识。因此,近代以来,具有相对先进性的“天赋人权”在中国得以接受和传播。

显然,“天赋人权”这类规范性概念,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此类概念的有限性。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创造力不足,特别是基于价值理念,构建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前进,并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标识性概念还很有限,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近几年,这一被动局面正在改变,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超越了狭隘的基于利益关系的“国家结盟”和“利益共同体”的传统意识,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愈来愈广泛地为世界所接受。

中国经济学的本土话语构建

姚 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学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3年,1994—2003年,2004年至今。第一阶段的主体是20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思潮,经济学家、特别是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开始摆脱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关注中国现实问题,积极参与中国的改革实践,并为此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在这个阶段,西方现代经济学开始引入,但是就研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应用还非常有限。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系统地引进现代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体系。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外,各主要大学的现代经济学教育开始形成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使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分析工具从事研究工作。进入第三阶段之后,海归学者大量增加。与此相呼应,各大经济学院(研究机构)开始引进严格的“非升即走”的升等制度,学术发表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经济学研究进入繁荣时期。

然而,在发表繁荣的背后,中国经济学也存在诸多隐忧,尤其是没有建立起本土话语体系。什么是本土话语体系?它不是自说自话,也不是脱离国际学术界另起炉灶,而是扎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标是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具体而言,它应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研究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2)具有理论抱负,从中国的特殊性中发现普遍性,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3)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批评和学术进步。在精神层面,构建本土话语体系,就是回归20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归,而是在更高层次上发扬光大八十年代“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精神,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手段研究中国问题。

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设定研究议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实经济问题,尽管不是每项研究都具有应用价值。否则,经济学研究就失去了意义。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突破都是来自于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比如,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自于他对美国企业垂直一体化的观察,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斯定理”则来自于他长期从事美国反垄断法的研究。然而,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成长,当今西方经济学已经进入瓶颈期,学术研